

邵阳市教育史料选编

第 1 辑

邵阳市教育局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

邵阳市教育史料选编

第一辑

(内部资料)

永理先生

書存

188



邵阳市教育局教育志编纂办编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邵阳市一中校史	陈锡兑 (1)
邵东县一中校史	刘屏非等 (22)
邵阳爱莲女师校史	苏缙如 (42)
宝郡联立中学史略	蒋业儒、刘一禾 (61)
邵陵中学校史记略	颜希文 (72)
偕进中学史略	马健、李仲平 (88)
邵东灵山中学校史简编	刘国荣 (96)
新邵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史略	校史编写组 (103)
民办城西中学十六年	曾令芳 (111)
邵阳市第一所公办小学史略	苏缙如 (116)
新邵二中前身——大同高小史略	刘泽南 (131)
邵阳市女子教育发展概况	张凤鸣 (145)
建国初期原邵阳县小学教育概况	张家驹、陈球 (151)
追忆导群中学	刘劭吾 (165)
忆民生小	肖心刚 (177)
马邻翼事略	李仲平 (181)
王子鑫事略	廖人杰、廖人伟 (187)

贺曼真事略.....	李仲平 (194)
谢培球事略.....	颜希文 (210)
伍芝事略.....	伍东白 (214)
邵阳市建国以来教育大事记 (1949—1984)...	曹清高 (218)
编后.....	(273)
附：征集教育史料启事.....	(274)

邵阳市一中校史

陈锡兑

邵阳市一中的前身是湖南省立第六中学。1941年2月建校，是当时第六行政区内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首任校长是当时闻名全省的教育家张干先生。

省立六中建校初期，由伪湖南省府指拨原省立四职兴隆街旧址为校舍，后因场地狭小，1942年上期，伪省府再度指拨与本校毗连的法院坪兵棚归本校。至此合原有校舍面积，计约25亩，可勉强容纳。此后，按计划每年春秋二季各招高初中新生一班，到1943年下期，便发展到高初中各六班，计学生618人的规模。根据当时第六行政区的实际需要，学校于1946年停招初中新生，每期改招高中新生二班。

1944年，日寇内侵，学校曾一度迁至新化筱溪，到1946年奉令复员。1949年邵阳解放，即由军管会接管。1952年12月，学校更名为邵阳市第一中学，并着手在市郊李子园今址新建校舍。1954年新校舍落成，高中部迁至李子园，是为校本部，初中部仍留兴隆街旧址，是为校分部。同年，学校分部改名为邵阳市第四初级中学。至此，邵阳市一中便成为当时邵阳地区一所唯一没有初中的高级中学。直至1965年下期，邵阳市三中拨来四个初中班，学校始恢复为高初中俱全的完全中学。至今，学校有高初中45个班，学生2600余人，教职员181人。

学校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一直是省属重点中学，1978年，湖南省革委又正式行文，重新确定为全省重点中学。

解放前的省立六中（1941 49）

1940年，正是日寇铁蹄践踏我国神圣领土，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第四个年头。当时伪湖南省府在一些有识之士教育救国的理想推动下，决定在省内十个行政区，各设完全中学、中级师范和职业学校一所。邵阳当时隶属第六区，省立第六中学，即为该计划内之一校。

1941年1月，伪湖南省府任命原省教育厅督学张干为省立六中首任校长。张干，号次仑，新化县大同镇西冲黄土坳（今属新邵县）人。1884年生，1908年3月毕业于湖南省中路优级师范物理化学科，修业五年半，获师范举人称号，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1913年起曾先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及省内外各公私立中学数理化教员多年。1941年奉令筹办本校时，曾在上报表上填写本人志愿为：“复兴民族，使世界进入大同，而男女老幼各得其所。”

张干于1941年2月7日到达邵阳，随即到校视事，并呈报伪省府备案。2月8日接收原省立四职校舍校具。3月12日树立“湖南省立第六中学”校牌，后即以是日作为学校校庆日。18日成立招生委员会，接着组织招生阅卷事宜，25日发榜。计录取高初中新生唐伯福、丁宏毅等101名（其中备录一名），实到97名，此即学校高初中第一班。

张干选聘教师，一向坚持三条原则：学有专长，诚履笃实，久于其任。如发现合乎此三条中之二项者，就多方延揽，既

聘之后，凡受到学生普遍爱戴者，就尽量挽留，无系统之分，无地域之界，只求堪为师表。所以学校自创办以来，教职员工，融洩无间，群而不党，同而能和，虽在寇氛猖炽之时，大都安心教学，不离职守。学生因而潜移默化，尊师重道，乐于受教。查学校初创时第一批聘任的教师田仕清、宋诗璟、栗仲侃、石广权、廖先任、夏天朴、邹芝山、曾志素等，一般都有大学本科或高等师范学历，学有专长，热心教育事业。

为了树立良好的学风，学校于创办之始，即特别注意养成严肃认真的风气。学校首次招生，应考学生粟子安成绩达到录取水平，因誊录错误，未列录取正榜，后经查明录取，准予入校，经办人周葆元即以此引咎辞职。又1945年僻处新化招生时，学生周而璠、罗仲辉、刘启焜三名因购买试题，均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工人钟孝海则送与当地警察局押办。学校历届招生考试，试卷一律密封，如有亲朋故旧、权贵名门来函要求照顾者，一律不予启封，录取全凭成绩。即使在新化张干校长故乡，也不例外，所以历次教育厅派员视察时，往往得到好评

学校当时行政组织，遵照当时部颁《中学法》之规定设置，课程也按部颁规定安排。对训育目标之确定，制度之制定以及具体实施，都有详细规定，以便培养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信心，实践勤劳节俭之生活，启发互助服务之精神，俾成为文武合一之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用。”此外，在生活方面，教职员从校长起一律与学生共进餐。1943年7月16日，学校派教师马克礼去南岳出席全省中等学校教育检讨会时，曾有人提出：“学生伙食可否按其家庭经济情况分组？”学校则坚决认为：“不可。恐破坏共同生活，发生贫

富阶级也。”他如起居作息，均有定时，师生员工，一律遵守。晚点名后，校门下锁，九时全校熄灯，非有特别事故，经学校许可者外，不得延长关灯及开门出入时间。

学校经过三年努力，已完成高初中十二个班的建制，规模初具，但教学设施仍不够完备。本计划从1944年上期起，继续改造校舍，添置图书仪器，使学校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不料改建校舍计划仅完成教室六间，便传来湘北战事紧张的消息，邵阳也接到疏散命令，同时会考亦奉令停止进行。在没有正式接到疏散命令之前，为防患于未然，学校将各项文件、帐簿、表册等于6月20日运至新化筱溪待命，同时急电请示去向。直到8月26日才接到教育厅指示确定在武冈洞口一带妥觅校址，准备迁移，8月30日又接到伪厅长王凤喈手谕，准予在新化继续办理复学事宜。

9月3日，学校租定新化大公乡白宁龚氏宗祠为临时校舍，着手复学工作。因政府核定之疏散费84,644元，一直没有发下，随即垫款派谢国聪、苏缙如两人再到邵阳搬运图书仪器以及校具等项，无奈当时寇氛日炽，交通阻塞，谢、苏两人就购置木排，意图顺流而下，或可抢运部分财产，又苦于浮桥军运频繁，严密封锁，因而校具图书仪器随同木排全部陷落邵阳，数载经营，尽付流水，殊属痛心。

为争取时间，保证青年学生能继续学习，学校决定于10月1日在新化大公乡白宁龚祠正式开学。只是当时播迁未定，联系中断，凡校具添置，教工薪给，办公开支，全赖借贷维持，幸广大教职员工，均能共体时艰，不以枵腹为苦，常川驻校，按时授课。岂知这四面环山之穷乡僻壤，也非乐土。1945年4月初旬，敌寇率众西犯，当地群众纷纷避于深山。11日下午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疏散措施，连夜赶印

疏散证，同时函请当地乡公所制发远地员生难民证。学校所有员工，除少数有守校任务者外，均于12日全部离校转移。13日黄昏，敌寇向筱溪进发，寇骑所至，间有烧杀。经白宁时，曾于校旁枪杀守校厨工杨克仁，血迹烂斑，惨不忍睹；学校损失估计当在三万元以上。

幸自敌寇偷渡资江以后，本地秩序逐渐恢复。为救济失学青年，遂不避艰险，决定于5月1日起筹备复课，并定于5月7日正式上课，全校师生员工都先后回校，学校正常秩序逐渐恢复。此次因避难疏散而耽误的时间仅三个星期，所有师生均平安无恙，实属万幸。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学校本应立即迁返邵阳复学，无奈原兴隆街新旧建筑，多被炸毁，只得暂租大公乡黄土坳新修之张氏宗祠继续上课。

此次邵阳沦陷，学校损失惨重，据统计共损坏房屋建筑14栋，校具2,460件，图书482册，仪器342件，总计金额达107,772,100元。

但回邵阳开学，势在必行。学校当即派事务主任张维城回邵筹划重新建校事宜，张干校长亦两度赴省交涉重建经费。1946年8月，新建校舍基本完成，张干校长率各处员工回邵筹备复员。19日教师先后到校，20日便在邵阳着手办理招生工作，经初复两试，录取高13、14新生两班，男女兼收，只因校舍尚待扩建，本期奉令停招初中新生。9月10日，新旧学生陆续到校。为使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提高教学质量，以期一改避难山村时的临时性将就局面，学校于9月29日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养成学生读书风气及如何促进学生体力等问题，决议：1.举行国语、数学、英语、理化、讲演、游艺、体育比赛，并开展短足旅行活动；2.注重学生平时成

绩；3.严格考试；4.多购图书杂志；5.监察自习。此外，还决定自10月1日起恢复内务检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继续发动并不断扩大内战，进行所谓“勘乱”动员，开展所谓“肃奸”活动，控制与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精神。1947年2月，在邵阳伪保安司令兼伪专员孙佐齐及其机要秘书傅德明的策动下，无故将省立六中学生李忍生、李松柏等11人，以共党嫌疑密捕入狱。张干校长闻讯急如星火，于是自新化绕过邵阳，经兰田、永丰去长沙向伪省府、教育厅汇报、交涉，同时联络各校取得声援。伪省长王东原迫于形势，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学生。3月12日，骇人听闻的永和金号惨案发生后，孙、傅等企图嫁祸于人，于事发后第二天，傅德明闯入学校，将原被捕后释放的学生李忍生等叫到校长室，威逼利诱，迫使他们在早已印制好的自首书上签字，还诱迫学生诬陷他人制造永和惨案，妄图逃脱罪责，都被学生严词拒绝。其后案情真相大白，孙、傅之流均受到应有惩罚，李忍生、李松柏等11人才免遭杀身之祸。

学校成立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即指派军训教官来校，实施所谓“党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并成立相应机构。1941年5月即呈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员来校组织直属区分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六中区队部，明确提出：“实施党化，全校教员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党。”“高中学生全体，初中学生年龄在16岁以上者，一律令其加入三青团”。另外，学校当时还提出所谓“四化教育”，除身体钢铁化，行动纪律化，读书做事科学化之外，尚有思想三民主义化。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青年学生思想控制之严密。

但广大师生对集体加入党团之规定，往往持抵制态度，

不少师生利用各种借口，百般推托，并未全部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

内战时期，物价腾飞，一日数涨，而当时的反动政府于1946年3月取消了教工的公粮薪米供给，给广大教工带来严重的生活困难。按当时一般教师月薪伪币5万元，数额不可谓不大，但这5万元之数，折合食米，不到两石，一个三口之家就有有米无薪之虞。这5万元在1945年下期，尚可买到食米6石，可勉强维持起码生活，当时却不及半年前的三分之一，亲老失养，儿女啼饥，于是肖则孝、张维城、刘蔚吾、陈其策等人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决议，于4月18日呈请学校设法提高待遇，要求至少应恢复1945年下期的水平，并于5月1日前作出明确答复，否则将不受聘书条文之约束，而采取自由行动。经两度转呈伪教育厅，均以“共体时艰”、“以青年学业为重”等语相推诿。张干校长迫不得已，亲赴省据理力争，才得到“由校方筹给食米”的答复。广大教师果能共体时艰，以学生学业为重而继续授课。

教职员之生活清苦如此，学生之贫寒则更不待言，但当时的反动政府仍巧立名目，多方盘剥，捐献摊派，无有已时。如1941年11月开展“奉令协助献机一元运动”，每位教师奉令献赠1元；1943年3月奉令催缴学生战时公债；1942年12月奉令募集滑翔机捐款；1943年4月募送邵阳各界文化劳军委员会捐款700元，6月开展捐献救灾劳军运动，每位教职员至少捐献5元。

到1949年上学期结束时，张干校长已经是65岁高龄的老人了，至此，他从事教育工作已达40余年。特别在学校任职期内，惨淡经营，中经日寇内犯，反复播迁，经费无着，历尽艰辛，心力交瘁，请辞校长职务获准，乃功成身退，

解放以后，仍致力教育工作，先后在妙高峰中学等校任教，因此毛泽东同志和谢觉哉老人在谈到张干时说：“（他）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是吃粉笔灰，了不起，了不起！”

张干卸职后，伪省府曾委派朱锡紫为校长。按朱为长沙人，受到邵阳所属各县的强烈抵制，没有到职。不久，伪省长王东原推荐李式相为校长。一九四九年下学期，工程师龙得云得到任命，接长学校。

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十七年（1949—1966）

1949年10月，邵阳解放。11月，上级派军代表廖六如接管学校，并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校长则由邵阳专员公署专员魏国元兼任。

当时学校接管的方针是“暂维现状，逐步改进”，以边“接”边“管”的方式进行工作；同时在“宁慢勿乱，宁健勿偏”的思想指导下，学校一切行政教学工作都照常进行。教师与学生的情绪，一般都较稳定。但反动党团组织，则坚决予以取缔；公民课、童子军课、军事训练以及诸如纪念周活动等，一律取消。

不久，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教师、学生、工人均有代表参加，定期参与学校大事的计划与安排。

从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以及镇压反革命运动，接踵而至。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围绕“三大运动”，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以及反特教育。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学校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学校出现了参军参干的热潮。据1950年一张陈旧照片上的人数清点，参军参干的即达

66人之多。

1949年下期结束时，龙得云校长调离，原副校长廖六如调湖南师院外语系任教，潘世棣接任副校长。解放初期，学校原有教师，几乎全部留用，一般保留原职原薪。但他们均来自旧社会，因而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乃当时迫不及待的任务。专署文教科遂于1950年2月，于学校兴隆街原址，举办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学校全体教师参加，此后并建立每周两小时的正常学习制度，普遍开展反封建教育，并以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三个专题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广大教师的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土改运动中，一般教师社会活动频繁，对教学工作，不无影响。1952年3月，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先后发出通知，要求纠正中心工作过多的偏向，明确指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全面发展，提高教学质量。”此时，学校开始实行五级记分制，在教学中开始注意贯彻基本技术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学生中成立各类生产小组，学校并开辟一定生产园地，进行实习作业。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52年暑期，学校全体教师参加了在今市二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崇美、恐美、亲美思想，得到了初步批判，同时还进行了反封、反资和反帝教育。

1952年12月，学校奉令改名为邵阳市第一中学。专署文教科左维提议在本校现址李子园修建新校舍，原校长、建筑工程师龙得云负责总体设计工作。1953年3月，教学楼、办公楼、食堂等主要建筑群竣工，专署文教科再度拨款13万元修建学生宿舍及其他配套工程。1954

年春，新校舍全部落成。

1955年至1956年，学校师生积极投入扫盲活动，并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顺利开展。1956年暑期，市委在市四中组织全市教职员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结果有孙梅荪等二人离校。

在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学校坚持“面向教学”和“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原则，认真对待教学工作，教学质量逐年提高。1955年高考，学校总分名列全省第二。

1957年“反右”运动中，学校有左智、粟海洲、李荣、刘克济、陈其策、刘文修等六位老师被错划为右派，或降级降薪，或清洗出校；接着又有刘范金、曾谷荪等三位老师被当成“白专”典型，以“拔白旗”的形式，进行大会批判。凡此，都严重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与自尊心。

1958年，学校大搞劳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但也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1959年，学校种植蔬菜面积达30亩，牲猪发展，亦颇迅速。因之从1960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学校蔬菜及肉食均能基本自给。另据记载：1958年学校共支援工业6万个以上的劳动日，1959年支援农业17,773个劳动日，特别是同年9月大战洋溪桥，连续苦战36小时，在九个山头上开荒近70亩，并突击种下红薯等作物。又如学校的小水泥厂，全靠土法上马，保证了向家滩拦河坝工程的全部水泥供应。

1959年初，学校规定学生每周劳动八小时，教师每周只参加劳动四小时，其余时间，照常上课。因而当年10个毕业班，高考成绩名列全地区第一，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升

入高等学校，学校先后被评为市、地、省及全国先进集体，出席各级表彰大会。1960年9月，副校长罗伯升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先进代表大会，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并荣获由周总理署名的“先进集体”镜屏一方。

1962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社教运动的开展，唯成份论的思潮日益严重。当时凡非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连班上的小组长和课代表都不能担任，1964年度有一个高中毕业班，成绩在前六名的学生中，仅第二名因家庭出身为手工业者在高考中获得录取，其余五名均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选。

1964年6月，茶陵一中发生了震惊全省的所谓“龙甫腾事件”，严重影响了学校教师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更是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成为龙甫腾第二。

在这段时期内，学校十分注意利用社会力量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帮助他们牢记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舍己救人的小英雄戴碧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在朝鲜前线献出双手、回乡后又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的谭长桥，均先后应邀来校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学校总务主任熊启凡，是1927年入党的革命老干部，调来一中后，即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学校工作上，深受师生爱戴。学校也间常请他向青少年介绍自己的光荣斗争历史。同时，也曾多次邀请学校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教师讲革命故事，讲授《谁是最可爱的人》之类的课文。

学校十分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1959年，全校同学普遍通过劳卫制一级，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279人。

1960年下期，在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学校获团体

总分第一，女子短跑，破两项市记录；全市篮排球赛，女子组双双夺魁，男子组获篮球冠军、排球亚军。当年，学校代表邵阳地区出席省运动会的运动员达39人，代表省出席全国运动会的有二人。

学校从1954年起，即着手进行电化教学，当时学校仅有一台“五一式”简单透视幻灯。青年物理教师刘蔚起等首先利用幻灯演示了“沸腾”现象。从此，幻灯教学遂为全校师生所喜爱。其后，“流线”、“毛细管现象”、“饱和态”等先后搬上银幕。除理化组外，在生物、历史教学中，也广泛加以利用。1957年，上级配给学校一台科普幻灯机和显微幻灯头，电化教学的范围更形扩大。但“文革”一开始，这一新生事物即受到扼杀。

学校图书馆，经二十余年的积累，藏书已达三万册以上。解放前即已逝世的著名藏书家、原《大公报》主编李抱一先生，遗存大量线装古籍，1954年其弟李景范老师（1949年任本校教导主任，解放后留校任教）将抱一先生的遗存全部书籍，捐献学校，总计4447册，其中包括《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珍贵古籍。

学校十分重视团的工作，团的活动开展得经常、活跃。1964年，学校团委书记蔡福英光荣地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荣获锦旗一面，回省时又受到张平化同志的亲切接见。

1959年至1963年，省委副书记周惠，副省长周世钊，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寿祺等先后来校视察或检查指导工作，给全校师生员工以很大的鼓舞。

动乱多难的十年（1966—1976）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难。接着，市委工作组进驻学校，一场大抓“黑鬼”的运动，随之兴起。曾几何时，校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白色恐怖笼罩全校。以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老右派、现行反革命、地主分子、走资派等名义，先后被揪斗的达15人。这些被揪出的所谓“黑帮分子”，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日夜被严密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常被强迫参加旨在折磨肉体的繁重劳动，还挂牌游街示众，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与此同时，学校还出现“赤色恐怖万岁”、“一中必须大乱”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极左标语。

在此期间，学校名义上仍保留党的支部，接受市委领导，甚至被揪出的党员干部仍参加组织生活，但实际上党的领导早已名存实亡。不久，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影响下，工作组撤离，学生也纷纷外出串联，有行动自由的教工，或回家，或外出。学校一切工作，全部陷于停顿。

1967年初，市委另派联络员来校指导工作，但不久即行撤出。此时教职员及学生中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多则数十上百人，少则三五几个人，各树一帜，相互攻击，并分别与校外派别组织挂钩联系，以取得支持并扩大势力。特别是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以煽动武斗之后，学校武斗事件接连发生。2月16日，竟因派性恶性发展而酿成震惊全国的行凶杀人事件，结果首犯孟伟（学生）被判死刑，凶犯胡钢强（学生）被判死缓，另徐琳等三人（均系学生）被判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三年有期徒刑（现已释放）。此外，学生杨连清，因参加市里派头头组织的武斗，在双丰丧生。

1968年10月，“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百